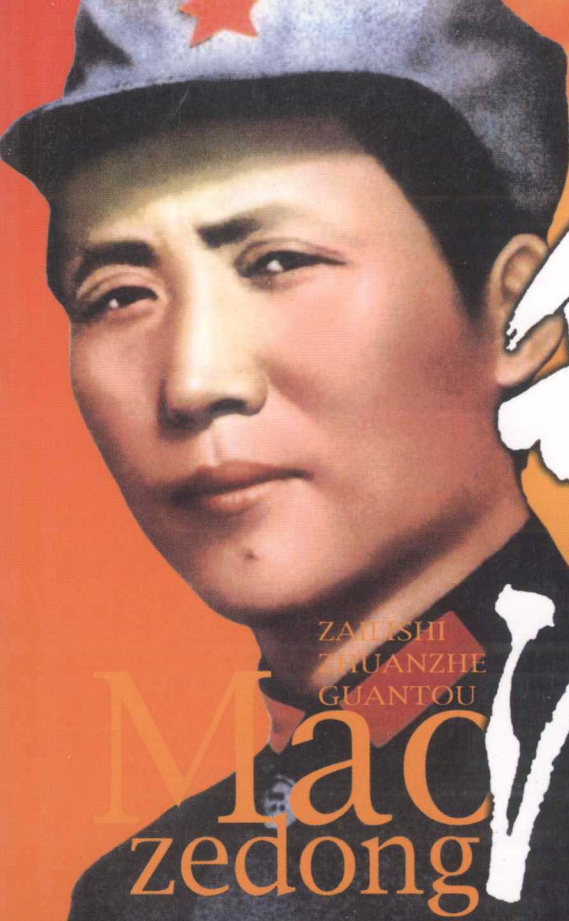




ZHANGSHI
ZHUANZHE
GUANTOU

Mao
zedong

毛泽东

关键在历史
转折关头

张士义 著

②

中国社会出版社

张士义 著

在历史转折关头



④

Maozedong
zai lishi zhuanzhéguāntó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张士义著. —2 版.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87 - 1541 - 4

I. 毛... II. 张... III. 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791 号

书 名: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

著 者: 张士义

责任编辑: 孙晓青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16392 电 传: (010) 66026806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上



第一章 惊涛拍岸——毛泽东与五四大潮	(1)
漫漫成长求学路	(2)
家事国事天下事	(11)
五四大潮露锋芒	(22)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34)
第二章 中流击水——毛泽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44)
中共三大进班子	(45)
国民党内展才干	(54)
农民运动动真格	(64)
沧海横流显本色	(76)
第三章 独辟蹊径——毛泽东与工农武装割据	(89)
霹雳一声起暴动	(90)
井冈山上战旗红	(103)
打铁须先自身硬	(112)
战略战术显神通	(127)
第四章 当仁不让——毛泽东与遵义会议	(136)
命运多舛	(137)
改变策略	(147)



正面交锋	(155)
激流勇进	(161)
第五章 天赐良机——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72)
逼蒋抗日	(173)
喜讯传来	(185)
和解方针	(195)
谈判经过	(206)
善后事宜	(220)

下

第六章 和战之间——毛泽东与重庆谈判	(241)
和国方针	(242)
应邀赴渝	(255)
谈判桌上	(271)
谈判桌外	(290)
以战促和	(302)
第七章 打破神话——毛泽东与抗美援朝	(312)
韩战爆发	(313)
防患未然	(318)
出兵决策	(324)
运筹帷幄	(344)
边谈边打	(352)
第八章 喜忧参半——毛泽东与苏共二十大	(368)
风云突变	(369)
亡羊补牢	(380)
以苏为鉴	(389)

风波再起	(400)
后顾之忧	(410)
第九章 面向未来——毛泽东与中美和解	(416)
投石问路	(417)
乒乓外交	(426)
基辛格密访北京	(431)
在联合国的意外收获	(439)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450)





第六章 和战之间

——毛泽东与重庆谈判

经过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变得更加从容和练达。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对蒋介石集团又联合又斗争，力促其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又面临着和与战的抉择。蒋介石要打内战，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毛泽东力争和平，便将计就计，做好两手准备：要谈就谈，要打就打。蒋介石先声夺人，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重庆谈判，蒋介石搭台，毛泽东唱戏。43天的“演出”，好戏连台。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和领袖风采，令人敬佩不已、叹为观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题记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但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国共两党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主张民主改革，实行动员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伴随着两条路线的矛盾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和冲突，国共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

和 国 方 针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当作主要作战对象。无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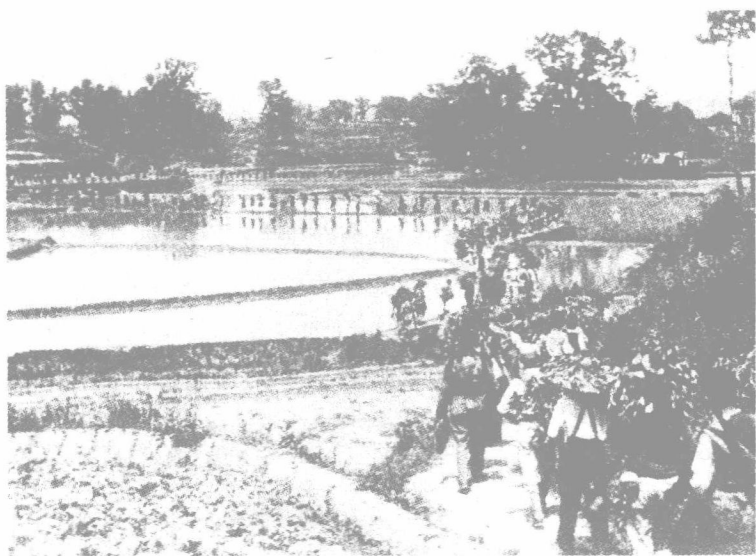


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正面战场都是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国民党也表现出较高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及武汉等地的保卫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国共关系方面，国民党也表现出了较多的团结愿望，营造了较为融洽的合作气氛。比如：同意不向红军部队中派遣国民党人员；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出版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吸收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如：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战争，并加强了在国统区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另一方面伺机深入敌



朱德（左三）、任弼时（左二）、邓小平（左四）、左权（左一）等八路军将领正在东渡黄河



开赴前线的新四军

后，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相互配合的战场。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中心武汉设立了长江局，以便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及时协商。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同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公开接触、广交朋友、开诚合作。

这一切，都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成为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条件。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广州和武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开始调整侵华方针：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日军主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日军占领区内，则加紧



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也变得严重起来。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在敌占区成立伪中央政府。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虽然一直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但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也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恶浪，使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并一度处于破裂边缘。

在国共关系错综复杂并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为重，使国共之间的阶级斗争服从和服务于中日之间的民族斗争，同时，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使它降日降不了，反共反不成。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真总结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四条策略方针：（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1939年的毛泽东

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三）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

在打退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8日发出了《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统区的党组织要“隐蔽精干”，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年1月，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统区的党员努力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1940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上述方针和策略，有力地武装了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整个局势的发展，更加妥善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各种棘手的问题，从而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国共关系，使蒋介





石集团不能放下抗日旗帜，同时也团结了广大的中间阶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亲日派卖国贼。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同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正式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1942年冬苏联红军在伏尔加格勒战役中开始反攻，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作战中也取得重大胜利。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对国共合作的发展远景做出了设计。

继1942年7月7日发表《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提出在抗战胜利后中共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的主张后，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在战后继续实行“和国”方针，并解释说：

在德、意、日打倒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以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清楚地认识到：“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为推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将全民族的抗战坚持到底，毛泽东一方面呼吁国民党政府厉行民主改革，以便“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在制止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1943年10月5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5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谈到时局和党的方针问题时，又进一步指出

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

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从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赴西安、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介绍了此前国共谈判的情况和中共的态度：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迎接，每天谈4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五点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二十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林四点”、“周五点”和“中央二十条”，分别是指：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四点意见（主要内容是：1. 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2. 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3. 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4. 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具体内容是：1. 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2.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3. 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4. 恢复新四军的番号；5. 撤离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同年5月1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其中，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有3条，分别是：1. 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 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 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就在国共两党进行新一轮谈判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国际上，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解放了本国国土，开始向东欧进军；美英盟军先后在法国北部和南部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欧洲各国内部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力量迅速发展和壮大，并相继成立了由各反法西斯政党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7月至8月间，延安《解放日报》集中报道了欧洲一些国家组建联合政府的消息。8月2日，该报又译载了英国工人日



报总编辑鲁斯特的文章《欧洲各国共产党》。文章说：“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参加政府，很明显地说明了政治力量的这种转变是有利于世界民主的。这种转变，在欧洲问题上代表着一种新的趋势。”

在国内，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出现了新的严重危机。自从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实施“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的所谓“一号作战”计划以来，沿线的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在短短的8个月内，相继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这种大溃败，不仅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不相适应，而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和无能。国内各界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丧失殆尽，要求实行根本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驻华官员和舆论也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表示强烈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鉴于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事实，在国共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代表又对中共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等项要求进行无端指责，称其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适时地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新口号。他在董必武8月17日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在会上明确表示：“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9月15